



文化与政治译丛

应奇 主编

The Revolution of the Saints

清教徒的革命

关于激进政治起源的一项研究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Radical Politics

[美] 迈克尔·沃尔泽 著

王东兴 张蓉 译

海外借



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文化与政治译丛

应奇 主编

The Revolution of the Saints

清教徒的革命

关于激进政治起源的一项研究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Radical Politics

[美] 迈克尔·沃泽 著

李东兴 张蓉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教徒的革命：关于激进政治起源的一项研究/
(美)迈克尔·沃尔泽著；王东兴，张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6

(文化与政治译丛)

ISBN 978-7-100-12488-1

I. ①清… II. ①迈… ②王… ③张… III. ①基
督教徒—研究 IV. ①B9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9674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文化与政治译丛

清教徒的革命

关于激进政治起源的一项研究

〔美〕迈克尔·沃尔泽 著

王东兴 张 蓉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2488-1

2016年10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5

定价：62.00元

Michael Walzer

THE REVOLUTION OF THE SAINTS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Radical Politics

Copyright ©1965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6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 RESERVED

本书根据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5 年版译出

文化与政治译丛

总 序

在自我流亡十六年，抵达新大陆八年之后的 1949 年，被誉为极具哲学天赋、但却毫无政治天分的汉娜·阿伦特给她终身的导师和朋友雅斯贝尔斯写信：“什么都没有改变。有时候我想知道，是向德国人逐渐灌输政治意识更加困难，还是向美国人传达哪怕是肤浅的哲学知识更为困难。”^①就正如她所称颂的海德格尔思想中席卷的风暴并非起源于 20 世纪，而是来自于遥远的过去，对“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感同身受的阿伦特这句话的问题意识也远远地越出了所谓德国问题的语境，而同样可以追溯到古典希腊时代。

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被我们时代的政治哲学家称作政治哲学的首要甚至是唯一的问题，不管这种说法的用意何在，也不管它遭到怎样的使用，它在相当程度上都确实是古典希腊时代的真实写照。通过柏拉图的如椽巨笔，以苏格拉底之死而被戏剧性地问题化的哲学家与城邦之间的关系，就被抽象成了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沉思与行动的对立所支撑起来的哲学框架是多维立体的，然而哲学与政治之对立的整个文化背景却大致是一元均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史学家们把古典古代的世界称作异教世界。

如果说城邦的崩溃是古代世界最大的精神动荡，那么基督教的兴起则直接导致了古典古代之文化一元性的终结；从“城邦之外非神即兽”到“教会之外别无拯救”，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的二

^① 见阿伦特于 1949 年 1 月 28 日写给雅斯贝尔斯的信，转引自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刘春芳、高新华译，译林出版社，2010 年，第 161 页。

元区分是对于这种对立的最好也是最终的表述。到了这个阶段，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其实已经让位于哲学与文化的关系，只不过这里的文化之核心层面乃是一种与古代循环论截然不同的线性的和末世论的时间和历史观念。而随着与基督教精神一脉相承的近代科学的兴起，随着科学日益成为近代文化的一种最具构成性和形塑性的力量，广义上的哲学与文化之关系的具体内涵就落实为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也只有到了这一步，才真正坐实了斯特劳斯所谓“科学与历史，当代世界的两大动力，在联手摧毁政治哲学这门学问上取得了成功”。^①

按照现代性的出生记，由进步观念护法的与古代世界的断裂本身就是正当性的一种标记。但是在早期现代性向晚期现代性的过渡中，现代性本身的弊端亦逐渐暴露，其动力则日趋衰竭，如罗伯特·皮平所言：“19世纪晚期的现代性危机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没有能力再生产它自身，也没有能力使它本身具备正当性。”^②这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文化危机，或者说是一种自我解释上的危机，而如果我们像皮平那样认为现代性的问题并不完全是一个文化的、社会的或政治的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那么这种危机的实质也就是在理解哲学与文化、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上出现的危机。但是同时，其程度并不稍逊地，这种危机也出现在后发现代性的国家和地区，只不过在后者这里，所谓文化的内涵除了在原发现代性内部固有的科学的维度，更增加了传统和本土的维度，或者也可以说，文化危机在这里乃具有双重的含义，而走出危机的尝试似乎就更有“毕其功于一役”的难以承受之重。

在作为现代性之发祥地的近代西欧诸国中，德意志乃是一个

^① 参见斯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中译文载于詹姆斯·A. 古尔德等编：《现代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② 皮平：《作为哲学问题的现代主义》，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1页。

后发国家,但比较巧合且深具范型意义的是,在政治和经济上属于欧洲落后国度的德国在哲学上却扮演着第一提琴手的角色,并一直享有文化之邦的令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德国问题成了史家眼中“整个近代史上最难解、最纠结和最全局性的问题”,近代德国也就成了我们观察哲学、政治与文化之复杂关系的最好场域。而用另一位史家弗里茨·斯特恩的话来说:“非政治的德国既是德国偏离西方及其持续的政治失败的原因,同时也是其结果。”^①然而,在经历魏玛共和倾覆、纳粹帝国败亡、东西德的分裂和重新统一之后,德意志的国家建设却逐渐走在了理性、节制和健康的道路上;在用宪法爱国主义总结从波恩共和国到柏林共和国的经验时,经历了与形形色色的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特别是所谓“决断论”和“机缘论”之毕生奋争的哈贝马斯最终把现代性规范内涵之锚泊定在它的政治维度上,并着重强调了与政治物相关的文化和以政治的方式做成的文化之间的区分;如果说在德意志传统的文化政治论述中,看上去是静态的“与政治物相关的文化”中的“政治物”和“文化”都是受到轻视和贬低的,那么“以政治的方式做成的文化”则试图用一种形成政治文化的动态机制克服文化与政治之间固有的分离和对立,从而以这种方式超越和扬弃了贯穿魏玛前后的权力与文化之争、文明与文化之争、“好的德国”和“坏的德国”之争,提供了一条走出非政治的文化,从文化政治走向政治文化的路径。凡此种种,都无疑将为我们思考被称作德国问题之“翻版”的中国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承黑格尔《历史哲学》中所谓“普遍奴隶制”之余绪,与希腊罗马的古典的古代形成对照的亚细亚的古代曾经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中扮演了某种暧昧的角色,但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主义内涵并没有被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主义彻底抽空,从而只具有历史

^① F. Stern,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Unpolitical German”, in: *History*, 3(1960), 转见于 Ralf Dahrendorf, *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pp. 314—315, Norton, 1967。

化石的作用。例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就曾经夫子自道其工作乃是对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延长”，并分别用《尚书》中的“器惟求新，人惟求新”和“器惟求新，人惟求旧”把古典的古代和亚细亚的古代刻画为古代社会的两种并行的进化路径——“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是革命的路线；而后者却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是维新的路线。”^①的确，在《资本论》的准备稿中得到集中表述的社会发展三形态论在保留和捍卫马克思的普遍主义冲动和雄心的同时，也为容纳和调和社会发展各阶段和形态的特殊性和多样性提供了富有张力的概念空间。

无独有偶的是，我们竟然也能够从作为 20 世纪中叶蔚为大观的现代化理论及其自我反省之产物的多元现代性理论中辨认出上述“延长”的异域回响，只不过时间和空间都已经发生了转换，而其概念内涵也早已今非昔比。从这种反省中所浮现出的文化现代性和规范现代性的视野去透视从中国近代的中西体用之争到晚近新一轮的古今中西之争，哲学在文化与政治的二元性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同于古典的古代，哲学处于与政治的某种直接对立的关系中，犹如“巨人之战”背影下真理与意见之抽象对峙；也与近代西方的情形不同，哲学与作为文化中最有力量的科学相互竞争，争夺空间，于焉衍生各种调和哲学与神学、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双重真理论。不同于亚细亚的古代，“哲学”具有牢笼万有的“作之君，作之师”的地位；也与近世中国主流论述不同，仍然试图仰仗中国哲学中最为精髓的体用模式解决古今中西之争。哲学现在所要“争夺”的不再是一个“论域”的空间，就好像它有一个其他学门不能染指的独特“论域”，而是一个“概念空间”，这种“空间”尤其出现在各“论域”交叉重叠处，其作用即使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也是具有弥漫渗透和贯通之功效的；哲学现在不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

^① 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第235页。

“仲裁者”，而是一个居间的“调停者”，不再是一个即将一劳永逸地提出“仲裁”的外在观察者，而更像是一个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概念框架的内在参与者；更为关键的是，在追问其他领域的正当性标准的同时，它必须——如果不是事先——给出自身的正当性辩护；只不过在文化间的语境中，这一点似乎尤为显豁甚至“自明”，但也唯因在这种语境中，最为重要的就既不是“见树不见林”的“格义”，也不是“会当凌绝顶”的“判教”，更不是用“区分敌友”来“劫持”政治之内涵，而仍然是在“哲学突破”两千多年后哲人们依然孜孜以求的“内在超越”，也就是要在“后形而上学”的视野中把轴心时代第一次区分开来的无限与有限、无条件者与有条件者、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在承认它们之间概念区别之重要性的基础上，重新把它们统一起来。

在从“内在超越”的视角论及“应然的权威具有多大的合理性？”这个问题时，哈贝马斯如是说：“‘道德视角’应当从世界内部对这个视角加以重建，把它纳入我们主体间共有的世界范围当中，而又不失去与整个世界保持距离的可能性以及全方位观察世界的普遍性。”^①而将近两百年前，黑格尔在谈到辩证法的“内在批判”时曾经说：“真正的拒绝必须是穿透了对方的力量，并且在他有实力的基础上与之遭遇；赢得胜利的途径并不是在某个别处向他进攻，在他不存在的地方把他打败。”^②至今看去，后面这句话既像是对我们仍然面临的真实处境的逼真写照，更像是对我们措置这种处境的智慧警示，于是愿以此语与“文化与政治译丛”的读者共勉。

应 奇

2014年4月，浙大紫金港

① 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页。

② 转引自童世骏：《“后世俗”社会的批判理论：哈贝马斯与宗教》，载于韩水法主编：《理性的命运：启蒙的当代理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前 言

我开始写作本书，期望能够心怀同情地研究一种我曾认为是不可思议和令人不安的人类选择：决定成为一个清教徒，约束自己及他人，实践一种既抽象又迫切的神圣理念。毕竟加尔文主义的(Calvinist)圣洁和敬虔令我们所有人都伤痕累累。如果说那伤痕没有留在我们的意识中，那么，它就留在了我们隐秘的精神中。回顾并认真深入思考这些创伤始终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写作过程中我认定，与我后来发现的其他既非不可思议也非令人不安的选择相比，对清教教义(Puritanism)的选择并不是那么与众不同。现在，据我看来，对现代历史中经常出现的那些进行社会与政治重建的自律的行动者而言，加尔文宗的清教徒是他们的开拓者，也是一种无须感到怀恋的旧秩序的摧毁者，同时是一种压制性制度的建立者，而人们在逃离或超越这一制度之前，很可能不得不忍受它。正如想要成为一个干“大事业”的人那样，也如注定会成为一个干“大事业”的人那样，加尔文宗的清教徒首先是一位具有非凡胆识、富有创造性和冷酷无情的政客，因为“大事业往往遇大敌”。

在描述清教教义作为政治激进主义的最初形式之时，我还没有打算写一部完整的英国清教徒史或者英国革命(English Revo-

lution)史。我也并不想用我对清教徒思想与运动的描述取代对17世纪历史的其他各种解释,而只是想做一个补充。非贵族的中上阶级的“兴起”、旧的贵族统治的“危机”和自尊自重的平民(Commoner)之“首创精神的胜利”,所有这些进程(以及支撑且伴之而生的经济转型)是贯穿本书的先决条件。然而,我认为,对于将清教教义与这些进程联系在一起的那种特殊方式,还没有人对之进行完整清晰的论述:不是指这些进程在宗教思想中的反映,而是指它们(以及其他的社会变革)给作为个体的男女造成的困难做出的创造性回应。

尽管我的论述大体上是以年代为序,但在符合我研究目的的情况下,我略过了某些年月,特别是在写作清教徒观念的过程中,我收集了一些都铎王朝(Tudor)、斯图亚特王朝(Stuart)及革命时期的材料。而对于一种共有的世界观,我有时候假定它存在,有时候则要证明它存在。当然,革命性危机都有其缓慢发展的历程,都是一种当权者犯错误和反对者反抗的持续积累的历程,都是一部丧失了妥协与和平机会的历史。我并没有尝试去探究这个问题。但是清教徒革命也有其基础,拥有激进的抱负和组织基础。这一般要追溯到加尔文(Calvin)本人以及英国女王玛丽一世统治时期的流亡者们的行动。我尽力描述与解释的正是这种基础。

在进行这样研究的过程中,我总体上忽略了可以说属于英国新教(Protestantism)那些小的左翼宗派,其信众常常被认为虽不是与现代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及共产主义者极为相似的人们,那至少是后者的先驱。这种论述在我看来并不十分有用。无论这些宗派[甚至是那些平等派成员(Leveller)]对于后来的系谱学家们来说有多么重要,但在17世纪的历史中,它们则是处于次要地位。如果说清教激进主义这一事实确实是被制造出来的话,那它也一定是由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an)时期的厉行戒律者

(Disciplinarian)、斯图亚特时期的长老会教徒(Presbyterian)和公会会教友(Congregationalist)——就是说,是清教徒的主流,是真正的英国加尔文主义者一起制造出来的。这些群体本身互不相同而且经年已变,这是事实,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尽力去证明他们一直共享某些关键的、与传统的教会和国家的制度不相容的理念,而这些理念一直倾向于制造激进的和革新性的政治行动。

我期望在以后的某段时间里,能够继续我对激进主义的研究,能够更加详尽地描述——也许是关于其他国家和历史——那些使得政治热情与戒律成为可能甚或必要的特殊条件。届时我将指明而易见的真实和激进政治能够有不同的形式,也将系统阐述一种对我们这个时代所采取的越来越极权化形式的批判。这样一种批判绝没有内含在我在本书中所论及的一切,因为我不想重复或最终倒退回去的主张;过去 15—20 年间,在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及政治科学的研究者中已然非常普遍的激进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的那种简单且毫无根据和说服力的平衡。我唯一的目的是能够在人类已有的知识和经验的范围内,对在我的同代人中已如此没有吸引力的清教激进主义进行解析。

在整本书中,我扩展了所有的缩写代码并把所引书名和引文中的拼写都改成了现代英语。这似乎不仅就技术原因而言,而且就编辑原因来说都是恰当的。至少对于对 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历史文本不熟悉的读者来说,若保留旧的拼写及缩略代码,会使有关清教教义的写作看上去会是令人绝望的遥不可及,甚至是怪异和不合时宜。然而,英国清教徒们的文献中最出色的内容的特点,就是它的不可思议的口语化的雄辩和单纯而感人的迫切感。我选择在准确性方面做出些微小牺牲,因为我希望在直观性和理解力方面有所收获。只是在引用诗歌(或是其他古老的不再被使用的语言和词句)时,我才保留原来的拼写。

这本书起初是我的博士论文,在写作过程及准备写作的过程

中,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这里不能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我在布兰代斯(Brandeis)、剑桥(Cambridge)和哈佛(Harvard)的老师们会在如下的那些页码中辨识出一种说法、点滴的交谈内容,或是某个古怪的想法——对我来说,所有这些与他们曾教授的更加系统的知识一样,都非常重要。我感谢他们所有人。我亏欠他们的,只能通过以我自己的风格来传播我从他们那里学来的东西来回报了。

在我全力去理解清教徒并写作本书的日子里,我的妻子朱迪丝·沃尔泽(Judith Walzer)一直陪伴我左右,并不时提出评论。书中行文的多样化及发生在我身上的变化大部分都是她的功劳。卡尔·J. 弗里德里希(Carl J. Friedrich)教授,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教授和巴灵顿·摩尔(Barrington Moor)教授,都通读了各章的最初几稿。他们的鼓励和建议同样对我有所帮助。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保罗·西格蒙德(Paul Sigmund)通读了论述古代天使学的那一部分并纠正了其中的许多谬误。

我在哈佛大学与塞缪尔·比尔(Samuel Beer)亲密共事五年。他对政治的准确研究是激发我自己研究同一主题的重要灵感来源。他主讲的课程《社会科学二》为我提供了第一个讨论的舞台,使我能够详尽地阐述清教教义的观点。与《社会科学二》的任课教师们——现在他们已成为各大学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聚会辩论,为我提供了第一批学术上的批评者。我感谢所有的参与者:塞缪尔·比尔、诺曼·伯恩鲍姆(Norman Birnbaum)、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哈里·埃克斯坦(Harry Eckstein)、克劳斯·艾泼斯坦(Klaus Epstein)、乔治·纳德尔(George Nadel)、梅尔文·里克特(Melvin Richter)、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

本书得到 1956—1957 年美国政府富布莱特项目的资助(Fulbright grant)及 1959—1960 年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

ence Research Council)的研究基金的资助。普林斯顿大学提供资助完成了最终稿的文字录入。我要感谢《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和《美国政治科学评论》(*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的编辑们的友好相助,允许我再版已发表在他们期刊上的文章的部分内容。最后非常感谢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特别是安·奥尔洛夫(Ann Orlove)小姐,她极大地纾解了我们在出版过程中遭受的创痛。

迈克尔·沃尔泽

纽约,普林斯顿

1965年6月8日

目 录

第一章 激进政治的出现	1
第二章 加尔文主义	25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加尔文主义	25
作为一种压制秩序的国家	34
作为基督教戒律的国家	52
反抗、改革及敬畏上帝的战争	64
第三章 加尔文宗政治的两个个案研究	75
胡格诺派教徒	77
英国玛丽一世时期的流亡者	105
第四章 清教神职人员：现代政治与激进的知识分子	130
第五章 对传统世界的抨击	168
清教教义和巨大的存在之链	171
从身体式政治体到国家之舟	193
政治和家庭	207
第六章 戒律和劳动的新世界	226
第七章 清教教义和绅士阶层：作为一种职业的政治	263
第八章 政治与战争	305
第九章 结论	340
文献说明	364
索引	373

第一章 激进政治的出现

为争夺权力而竞争和发生冲突的政治,搞派别、耍阴谋抑或公然开战的政治,可能普遍存在于人类历史之中。而一个有政党组织、行动有序、存在反对派与改革、具有激进观念与革命的政治却并非如此。这样说来,改革与革命的历史和政治秩序本身或权力斗争的历史相比,是相对短暂的。对一种现行制度不带感情色彩的评价、对不满与抱负的纲领性表达、那些投身于持续的政治活动的狂热者的组织化——公正地说,这三者都只是现代的,就是说是中世纪之后政治世界的面向。

现代政治的研究可以以 16 世纪的许多核心问题为起点: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与新政治现实主义、路德(Luther)和德意志的国王们及他们对天主教国际主义的攻击、博丹(Bodin)和新国王们的主权。但这本论著所关注的不是国家理由、国家化的教会,抑或是主权观念。它倒是关注 16 世纪政治历史中那些惊人创新的另外一些方面:革命组织及激进意识形态的出现。^① 革命

^① H. G. Koenigsberger, "The Organization of Revolutionary Parties in France and the Netherlands during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27: 335-351 (1955).

作为一种政治现象与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精神和道德准则，当然都与现代国家的兴起紧密相联。然而，认为那些被特别选定的和有组织的人群可能会在政治舞台上起到创造性的作用，他们会根据上帝的命令或是他们伙伴的计划摧毁既有秩序和重建社会的想法，并没有成为马基雅维里、路德或博丹的思想的组成部分。在建立国家方面，这三位作家都只是依赖于国王，无论他们把国王想象成是一位冒险者、一个基督教的执法官，还是一个世袭的官僚。而所有其他人都仍然是臣民，都被迫处于政治顺从的状态之中。但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因为在事实上，在现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清教徒们和市民们的革命行动发挥了与国王们的最高权力一样重要的作用。在瑞士、荷兰人的尼德兰、苏格兰，最重要的是在英国和后来在法国，最终推翻旧制度的不是专制主义的国王们，也不是依凭国家理由，而是本身受到新的革命性意识形态推动的政治激进分子形成的团体。

下文将会论证，正是加尔文宗的教徒们首先把政治思想的重点从国王转到清教徒（或者是一群清教徒），而后为独立的政治行为构建出了一套理论上的正当依据。被加尔文宗的教徒说成是清教徒的人们，其他一些人后来会把他们说成是公民：这两个名称的背后有着相同的公民道德感、纪律感及责任感。清教徒和公民一起暗示了作为私人的人们（更准确地说，是那些作为私人的人们中的被选定群体，被证明圣洁和具有德性的群体）重新融入了政治秩序之中，这种融入立足于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尽职的和持续劳动的新政治理念之上。这无疑是加尔文宗关于世俗行为理论的意义最重大的成果，在时间上要早于所有把宗教的世俗性注入经济秩序中的理论^②。加尔文宗的教徒们——日内瓦人（Gene-

^② 如下这部论著中间接指明了这一点，请参看 C. J. Friedrich, *Constitutional Reason of State: The Survival of Constitutional Order* (Providence, R. I., 1957), p. 59.